

名家名著·
此古老传奇故事原发现于一瓦罐，
现据之意译而成此书

【美国】马克·吐温 著
伊如一 译

44号—— 神秘的陌生人

MARK TWAIN

NO. 44,
THE
MYSTERIOUS
STRANGER



【美国】马克·吐温 著
伊如一 译

44号—— 神秘的陌生人

MARK TWAIN
NO. 44,
THE
MYSTERIOUS
STRANGER

江苏人民出版社

MARK TWAIN
NO. 44, THE MYSTERIOUS
STRANG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44号——
神秘的陌生人

(美国)马克·吐温 著
伊如一 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县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87,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300册

ISBN 7—214—00163—2

I·47

定价：2.60元

责任编辑 王理行

真正的陌生人

——译者前言

伟大的美国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去世已近80年了。其人其作，不仅在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里，而且在世界文坛上都已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但，正如历史上许多独创一格、影响深远的文坛巨子一样，其人其作也留下了一些身后是非任人评说。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其最后一部作品《神秘的陌生人》的评价论争。

马克·吐温去世六年之后，美国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一部遗作，取名为《神秘的陌生人：一个传奇故事》。

小说表现一个自称撒旦的年轻天使（同时自认是魔鬼撒旦的侄子），从天空来到中世纪奥地利的一个山村，在与三个村童的游荡嬉戏中，广显一番神通，大发一通鄙视人类、看破一切的议论，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研究马克·吐温的学者威廉·吉布森教授主编的《马克·吐温〈神秘的陌生人〉原稿集》。主其事者，除吉布森教授外，还有马克·吐温作品出版规划组有关人员。他们根据美国作家版本

中心的标准，按照作家手稿精心校勘，鉴别审定，将其作为马克·吐温文档系列丛书中的一卷出版。此举在财力上得到美国国家人文学术基金会编辑规划部的大力支持。

也就是在这部《原稿集》中，马克·吐温关于一个超人角色的故事，以其三种不同的文本，一同公之于世。

原来，作家于1910年逝世时，就已留下了三种手稿：

第一稿是《年轻撒旦记事》，因主要故事发生在小村埃塞尔多夫，故称为“埃塞尔多夫文本”。约5.5万英文词，写于1897年至1900年，文笔有所节制，尚未完全展开，全稿也未完成。

第二稿是《校舍山》，写的是一个名叫“44号”的年轻撒旦对汤姆·索亚和哈克·费恩施加影响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汉尼巴尔小镇，故又称“汉尼巴尔文本”，有些引者就径直称其为《汉尼巴尔神秘的陌生人》。仅约1.5万英文词，写于1898年，仍为未完成稿。

第三稿就是《44号——神秘的陌生人》。在本稿中，那个名叫44号的神秘的陌生人既非凡人也非天神，他成了印刷学徒，主要故事就发生在印刷工场内，故又称为“印刷工场文本”。约3.5万英文词，大部分写于1902年至1905年间，最后完成于1908年。三个本子中，只有此本是一部完成稿。

以上三部手稿均存放于伯克利市加州大学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内马克·吐温文档处。

马克·吐温遗嘱指定的遗著保管人是其文学秘书艾伯特·比奇洛·佩因。当他与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编辑弗雷德里克·邓尼卡准备于1916年出版作家此遗著时，所有这些手稿都在手头。他们俩采用了第一个未完成稿，即埃塞尔多夫文本，对

原稿进行了自由处置：删去足足四分之一原文（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内容，如用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及对说西班牙语的美洲人的战争，来暗喻西方帝国主义的章节）；又添加了一个在原稿中毫无踪影的人物——一个占星家，让他“代人受过”——干下了马克·吐温原先置于那个邪恶神父阿道夫名下的大部分卑劣勾当。由于《记事》一稿只写到第十章，没有“结尾”，他们将作为《44号——神秘的陌生人》结尾的第三十四章作为他们这个版本的第十一章；为了连贯，他们改动了其中的人名。他们还将第三稿题名的主要部分——“神秘的陌生人”用作第一稿书名。

对于这些处理，两位编辑并未公之于众，此后近半世纪内，只有个别研究者对前十章与结尾一章在主题与情节上的“脱节”问题提出过疑问，如埃德蒙·赖斯在1962年出版的《〈神秘的陌生人〉及其他故事》一书序言中指出，前十章所写的种种冒险经历，从结尾一章所阐明的主题看来，“实在并无必要”。而大多数论者，却纷纷据此版本对作家盖棺定论。

直到1963年，美国学者约翰·塔基通过对原稿的整理研究，发表了论著《马克·吐温与小撒旦：〈神秘的陌生人〉的写作》，方使真相大白。为了便于文学理论界进行研究，由吉布森教授主事，《马克·吐温〈神秘的陌生人〉原稿集》学术研究版于1969年出版。

美国马克·吐温学会，以及美国加州大学马克·吐温文库编辑部，都明确表示要以恢复“真正的马克·吐温”的形像为己任，提出要按作家本意，出版存真版本，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文库从1982年开始，以每年三部的速度，以加州

大学学术研究版为蓝本，首次出版马克·吐温优秀作品的存真普及版本。第一年出版的三部书中，就包括这部以“最后的手稿”为蓝本的《44号——神秘的陌生人》。在马克·吐温这部最后的作品新版问世时，美国合众国际社向世界发了专电报道。

1982年，约翰·塔基为此书新版写了前言。

正如塔基的前言及马克·吐温文库编辑部出版说明中所称，过去几十年来，由于版本上的以假当真，“于是，一个虚假的陌生人到今天还在招摇过市，而那个真正的陌生人至今仍默默无闻。”

1969年三种不同文本公之于世之后，到1971年，有的研究者，如约翰·梅，仍然认为，由于佩因1916年编辑的版本在结构统一上所作出的努力，因此，评论界归根结蒂不得不承认该版本在文学上是个“幸运的败落”，至少它仍然是部“编辑手法上的杰作”，一部“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作品”。1982年马克·吐温此遗著的真本普及版一问世，被马克·吐温文库编者称为“此故事伪造文本”的1916年“赝本”再无人为其争夺在马克·吐温经典作品中的“合法席位”了。

195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蒋一平据佩因1916年编辑的版本译出的《神秘的陌生人》。由于本书已有原文真版，因此自然也就该有相应的新译本奉献给中国读者。

1916年版仅11章，1982年版共34章，在篇幅上，由一梗概性的长篇故事，发展到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内容和主题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两部作品虽然都将背景确定在中世纪奥地利的一个山村

埃塞尔多夫，但却有三大区别。首先，旧本中将故事发生时间定为1590年，这时美洲新大陆发现已近百年，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欧洲中世纪也就结束了。新本将故事发生时间往上推了一个世纪，即1490年，这样就更符合中欧内陆山国典型的中世纪时代氛围——蒙昧、闭塞、缺乏理性，象征着人类尚未进入真正文明的阶段。其次，新本为了与昏昏沉沉的闭塞山村生活情景对比，把小说主要情节的发展安排在一个印刷工场中，因为在文艺复兴的启蒙时期，冲破中世纪黑暗禁锢的火花也正是从印刷工场里发出的。这样的时间、地点安排也就更具有典型意义。此外，主角也由一个自称“撒旦”的下凡天使，变成了一个非人非神的真正的神秘的陌生人，再加上一个他在人间的好朋友——学徒工奥古斯特。

这样一来，1916年版中三个山村顽童与小撒旦的终日游荡戏耍，变成了1982年版中印刷工场里学徒、工人与名叫44号的那个神秘的陌生人之间的劳动与生活。

马克·吐温本人并没有称小撒旦（无论是在埃塞尔多夫文本中的这个小撒旦，或是汉尼巴尔文本中的那个小撒旦）为神秘的陌生人。如三个文本简介中所揭示的，把小撒旦和神秘的陌生人这个说法联系起来的是佩因，因此，以塔基为代表的当代评论者要称其为“虚假的陌生人”了。

自称44号的这个神秘的陌生人，血气方刚，不名一文，他一来到城堡内印刷所寻求工作，马上就在一群凡夫俗子中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他和年轻、正直、好学向上，但又怯懦怕事的印刷学徒奥古斯特·费尔德纳成了知心朋友。他对这个凡人谈古论今，展望“未来”（小说中的1490年到马克·吐温执笔的20世纪初，这400多年的时间，都成为小说

中“泄漏”未来天机时想象驰骋的广阔天地），并向他不露声色地展现出“创奇者”超自然的神力。44号具有知人心迹的洞察力——他能“听到”别人心里的念头，能直接从别人的头脑里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他也正是这样接收奥古斯特脑中发出的各种操作指令，从而使那些存心要看他出丑的工匠们大为震惊。接着，不可思议的奇行异事开始在印刷工场、城堡内外接连发生——而只有奥古斯特知道这是谁的神通。奥古斯特这个17岁的印刷工，在44的启迪指引下，在参与44的行动中，也在探索通过充分利用自己的心智，究竟能使生命发挥出多大的潜能来。

马克·吐温的一些长篇小说，从《汤姆·索耶历险记》到本书，都具有对个人生活经历进行回顾、反思、折射与表现的性质。如本小说写到印刷工场时，马克·吐温显然重温了早年在汉尼巴尔的经历。在那个小镇，他12岁丧父，只好到印刷所去当学徒。一开始时，几乎和小说中的主人公44号一样，小克列门斯（作家本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不得不服服帖帖地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下手活儿，比如洗印版、上油墨，清理打扫废旧铅字箱以及其他杂活。同时，像小说中的44号一样，他也有多方面的创造能力，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使他后来从卑微低贱的地位中脱颖而出。也像小说中那个17岁的印刷学徒工奥古斯特·费尔德纳和44号一样，年轻的克列门斯通过实践、观察和刻苦自学，成为同龄人中的博学多识者，16岁时已在《汉尼巴尔周刊》上发表自己幽默诙谐的诗文。而他一度离开《信使报》印刷所，东去纽约时，也正是个17岁的少年。

小说甚至通过44号与奥古斯特对猫的感情描写，表现

了作家本人爱猫的生活习惯。从对浪迹天涯、扶弱锄强的流动工人东基瓦达姆的描写，也能感到作家对早年只身远行、到处为家的那种生活的追念和自豪。从奥古斯特·费尔德纳处心积虑竭力劝说44号皈依教会的行动，又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作家的好友特威契尔（一个虔诚的牧师）和作家的爱妻奥利维亚在这方面对作家所作的持续不断、但最后却归于失败的争取。因此，从44号不信上帝的那些言词，也可看出作家本人反宗教的精神。此外，如从印刷场主海因里希·斯坦的身上可以看到作家大哥奥里昂的影子。关于正直的神父彼得被诬“说错话”而解除圣职的描写，使人自然会联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因要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而被逐出正统教会一事在作家心目中的影响。总之，这部传奇中的许多人物都能在作家本人经历，以及见闻、感受中找出原型和影子，事件、场面、人物心态有许多也是作家记忆、反思的曲折映现。

当然，中世纪奥地利云云，只不过是小说家的假托，作家的原意在于借古讽今，以“奥”喻“美”，其中不乏对20世纪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痛下针砭之论，发出了“那时可真是好日子，但是已一去不复返了”的慨叹。

有些评论家认为：那座发出启蒙火花的印刷工场之所以隐藏在一座颓败的迷宫般的巨大城堡中，而且古堡中还有着成百上千间空关着的房间，这正暗喻着人类大脑还有大量没有开发、使用的潜力。马克·吐温这部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杰作，幻想丰富，立意新奇，事件神异，堪称为心灵探索的历程记——深入人的内心思想，又进入无意识、潜意识和梦幻体验的境界，最后直抵令人惊愕的“空空茫茫”之中，而要想成为心理上完整的存在，就必须勇于面对这种“空茫虚无”。

本书的写作手法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简洁、生动而透彻。人物又成为一种观察、反映周围环境的棱镜，在使人、物实体相当简化的同时，使环境气氛充满着心理真实性。

二是本书叙事风格元素非常复杂，过渡迅速，充满戏剧性的变幻，环环紧扣，引人入胜。如从最初的写实风俗画描写，通过夸张、荒诞手法的运用，转向神秘、寓言式的传奇、幻想后，两者又交叉纠结，齐头并进，还不时插入哲理的思考、心灵的探索。而所有这些手法的运用都没有破坏小说结构的完整和基调统一。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哲理阐发的深入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三者结合得浑然一体。

三是充满全书的幻觉效应，时间、地点、场景、情调的变幻莫测，恰如其分地交织纵横，形成了这个如梦如醒、似假似真、有虚有实、亦庄亦谐，充满寓言、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美国学者爱德华·瓦根内克特在《芝加哥论坛报》推荐此新版时，说它“令人心旷神怡”，是“一部狂放不羁的幻想曲”。

此外，全书于冷嘲热讽、峻刻严词中，间或也流露出明快隽永的幽默趣语，以及深沉的抒情，凝炼的论理，使人于此种炉火纯青的结合中，有嬉笑怒骂皆成妙文，恣肆酣畅，老辣生辉之感。当然，作家以前作品中那种逗笑无忌的轻松风格几乎已不复见。而小说中采用的以主人公奥古斯特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还是马克·吐温许多作品的特点。这样可以自由运用生动的口语，状物写人、借景抒情，使读者感到更真实、有趣、自然、亲切，穿插着对照、夸张、变形、荒诞等手法，相辅相成，得心应手。

在1916年版《神秘的陌生人》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由于对资产阶级普遍“民主”理想的破灭，对金元帝国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愤激万分，而又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阶级分析观点，因而将资产者损人利己、弱肉强食等日趋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的恶性发展，看成了整个人类普遍“人性”的堕落，甚至发出了“人不如畜性”的诅咒，最后还发出了“人生如梦”、“一切虚无”的悲叹。

此版一出，论者迭起，西方一些权威论者说从《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到《神秘的陌生人》，都表明作家晚年充满悲观主义。在我国，鲁迅于30年代也说过，该书一出，“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①；苏联则有一派观点，认为这是由于作家晚年“悲剧性地和工人阶级斗争隔绝开来”^②所致。

以上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颇为研究者所尊奉。可是，5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20年中，由于有关马克·吐温重要史实、资料的陆续发现、披露，尤其是《神秘的陌生人》一书三种文稿的公布，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重要研究成果的推出，这种观点已遭到有力的挑战。

我国于1981年先后出版了《马克·吐温自传》两种译本。^③值得一提的是本社版《马克·吐温自传》中许汝祉教

①见《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

②波布洛娃，《马克·吐温评传》，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张由今译，第201页。

③一为天津人民出版社所出孙强译本，另为本社所出许汝祉译本，一简一详。

授所作译者序《真正的马克·吐温》。文中引证了50年代后发现的富有说服力的资料，说明作家在晚年绝非憎恨人类、脱离工人阶级斗争实际的悲观主义者；正相反，他是一位抨击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杰出战士。

1982年版中44号对人类的评价较之1916年版中小撒旦对人类的诅咒鄙视，增添了一些亮色。他对人的美德善行及非凡创造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对人的无法自主的苦痛灾难也表现了深切的痛心。最明显的，书中也对人类的科学、文明表现了一种自豪的感情——如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笃信，对19世纪一些发明的赞叹，和对连神仙、天使也要垂涎欲滴的人间美味佳肴的夸耀。在马克·吐温这部晚期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到马克·吐温那种对人间不忍决绝而去的浩茫心事和深沉思考。

对1916年版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悲观”、“厌世”，我们不能持简单化态度。苏联学者莫里斯·奥西波维奇·门德松的观点颇有道理。他在其《马克·吐温传》1958年修订本中指出，由于作家的世界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在1916年版《神秘的陌生人》中，也有着与悲观厌世倾向相反的内容。他说：“吐温对人的所有攻击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其中许多是由于吐温创作手法上特有的安排：大量采用夸张法，言过其实，喜欢让主人公的语言带有怪诞离奇的色彩。……吐温往往使他的抨击——咒骂、攻击——具有双重的含义。看上去他似乎是谴责整个人类，但很快又使人感到他讽刺的主要对象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头面人物。在他谴责所谓的‘人类’的言论中，有一种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激情。他那含义深刻的哲理性语句往往成为揭露策动掠

夺战争的罪魁——‘基督教列强’统治者的一种方式。”^①新版中的一些愤激之词，也可如此理解。

根据约翰·塔基的观点，马克·吐温后期思想充满了矛盾，因此后期作品也表现出复杂性。他对人的本质和人的最后归宿一直存在着两种动摇不定的信念：人到底是一架奴隶般的、身不由己而且必然毁灭的机器，还是一种体现“自我”的自由与不朽的精神呢？他既勉强地接受了宿命论的观点，又对其进行不断的抗争，探求着“人生之谜”的最终解决。^②在本小说“埃塞尔多夫文本”中，他使故事成为他到1906年才决定发表的文章《人是怎么回事？》中的悲观论点的小说化表现。很可能由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不义战争和世界政局的险恶，使他感到人类前途暗淡，无法得救，因此自然引出了人类分文不值的结论，流露出一股愤怒的绝望情绪。但到他写“印刷工场文本”中的大部分篇幅时，他已走出了这种战争和政局布下的险恶、绝望的阴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人类得救的前景可能又有了新的希望。

但此文本大部分也是在他爱妻奥利维亚最后一次重病期间写下的。而大约正是在她逝世时，即1904年6月5日，他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先写下了预定作为结束的最后一章，其中发出了“一切虚无”、“人生如梦”的感慨。

在“埃塞尔多夫文本”中，马克·吐温曾借小撒旦之口说，人的命运是由他的第一个动作所决定的。这种悲观的机械宿命论的根子，在于他曾将人当作宇宙中一台身不由己的

^①莫·门德松：《马克·吐温传》，莫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②见他于1970年所写论文《马克·吐温晚年在“自我”与机器之间的思辨》。

机器。在“印刷工场文本”的结论中，强调人的思想是唯一的“存在”这点，曾被评论家视作在哲学上坚持绝对唯我论的观点。但在马克·吐温本人说来，这却正是对他原来那种悲观的机械宿命论的一种反动——虽然仍然没有超越唯心主义的范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正是美国在开发西部时形成的以个人奋斗精神和自由竞争观念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积淀。也许，马克·吐温正是以对理性、思想的这种绝对肯定，来对抗美国金元社会中那种市侩、庸俗的“唯物主义”——对金钱权势、财阀阔佬的顶礼膜拜吧。

1982年版中虽然有“人生如梦”、“生不如死”的慨叹，但马克·吐温从来没有借44之口诅咒过青年工人奥古斯特、劳动妇女卡特里娜、善良秀美的玛吉特、为人正直的古斯塔夫·费希尔、海因里希·斯坦、画家约翰·布林克尔一家乃至彼得神父一家；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了作者对穷苦人民深切的同情，对善举恶行分明的爱憎，对人间真诚情谊的珍视与渴求。加上对那浪迹四方、扶弱锄强、敢作敢为、永不消沉，既有学问、又有武艺的流动排字工东基瓦达姆所作浓墨重彩、甚至带点“神化”的描绘，都给人一股深刻内在的温馨之感。

诚如许汝祉先生在《真正的马克·吐温》中所说，马克·吐温在后期仍是那样“在时代的暴风雨中搏击长空，在思想上有所飞跃，不失为一个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的民主主义者、反帝战士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称得上是一个呐喊、奋进的马克·吐温。但作为一个内省、沉思的作家时，马克·吐温的人生哲学中，的

确也充满着由于他对社会、对生活缺乏科学分析而带来的深刻矛盾。由于“对资产阶级文明感到幻灭，对自己也产生了幻灭感”^①，因而在某些作品中显出某些“看破红尘”的倾向，甚至有悲观、厌世之感。这可以说是一个徬徨、愤懑的马克·吐温。而这两个“马克·吐温”又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

1985年是马克·吐温诞生150周年、逝世75周年，也是他的传世名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发表100周年，美国举行了隆重庆祝，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特聘好莱坞头挑导演、演员拍摄了5部根据马克·吐温经典名著改编的电视片，其中一部就是根据《44号——神秘的陌生人》改编的。这正反映了美国国内对这部人们所说悲观厌世而实则是极端激愤的晚年作品的高度重视。美国学者对此书也极为推崇。约翰·塔基认为此著是一部特殊的“心灵历险记”，有些论者认为它堪与《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齐名，一起构成了“马克·吐温的历险记”；菲力普·福纳甚至说：“即使马克·吐温仅仅只写下这么一部小说，它也足以确立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②

本书最后附上了短文《伊斯兰教的托钵僧和出言不逊的陌生人》，其理由是：此文与《44号——神秘的陌生人》是同一时期作品，时代背景与作者心态都一致，写的都是“陌

^①克里斯托夫·科德威尔，《论肖伯纳，资产阶级的超人》，收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

^②见菲力普·福纳：《社会批评家马克·吐温》（1958年纽约版）第55页。

生人”，两个陌生人似有一脉相承之处，附上此短文，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人士的多方帮助，在此无法一一列其姓名，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至于拙译舛漏浅薄之处，还望诸多高明不吝赐正。

译者

1987年7月于上海